

辨認漢語方言語言層次年代的幾個問題*

郭必之

提要 層次年代是語言層次研究中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釐清年代，可以增加我們對方言史和方言關係的認識。本文歸納了幾種辨別漢語方言層次年代的方法，包括“直接比較法”、“域外比較法”、“結構比較法”、“詞匯比較法”、“特字比較法”和“相對比較法”，並逐一分析其特點和局限。結論是：域外材料（對音、譯音材料）通常能顯示地域特徵，而且年代往往比較明確，是辨別層次年代最可靠的方法。但單用一種方法始終不夠全面，因此本文主張以“域外比較法”為主導、結合其他方法來探測語言層次的年代。

關鍵詞 漢語方言；層次；年代；江東方言

一 引言

我們討論語言層次時，總想知道每一個層次所反映的年代。¹ 近來研治漢語方言語言層次的學者，莫不為這個問題大傷腦筋。在這篇短文裏，我會歸納幾個前人用過的方法，並逐一探討它們的特點和局限。通過分析，希望能找到一個合適的方案，並嘗試提出“層次年代”這個課題在語言層次研究中的重要性。漢語方言的層次研究以語音為主，本文的討論也只集中在這一方面。²

二 辨認語音層次年代的幾個方法

談到對漢語方言語音層次的考察，當然要提羅杰瑞的經典著作（Norman 1979）。³ 羅先生根據廈門話“石”、“席”等字的文白異讀，指出廈門話包含了三個語言層次：漢代、南朝晚期、唐代晚期。他憑什麼認定各個層次的年代？在討論廈門話的“第二層”時，羅先生（Norman 1979:271）指出：

The second set of forms represents a later body of loanwords; the strong resemblance of these forms to those re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Qièyùn rime dictionary suggests that they were taken into the Min sometime during the late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 or soon thereafter.

明顯地，羅杰瑞是通過《切韻》的擬音來認定廈門話的“第二層”屬於南朝晚期：“石”的

*本文撰作和修改期間，先後得到秋谷裕幸、平田昌司、林英津、吳瑞文、張雙慶、丁邦新、項夢冰諸位師友的指正和鼓勵，謹致謝忱。

中古音是[*ziäk]，和廈門話“第二層”讀音[siaʔ]相近。後來不少學者都採用了這種直接跟古音擬構比較的方法。像陳忠敏（1998）和梅祖麟（2001a）在考察吳方言的層次時，發現開化話有幾個魚韻字唸[-a]韻母，包括“豬”[ta]、“鋤”[za]等，便把它們看作“上古漢語的殘存”，“因為它的讀音跟上古漢語魚部讀音類似”（陳忠敏 1998:349）。⁴鄭張尚芳（2002a）注意到溫州等南部吳方言好些虞韻字變得跟尤韻字同韻，唸[iu]、[iuw]之類的音，他認為“應是中古後期虞韻 io 高化為 iu 以後生成的層次”（鄭張尚芳 2002a:22）。[*io]、[*iu]分別是鄭張尚芳所擬早期和晚期中古音虞韻的音值。在以上幾個例子中，拿今音和古音比較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我們把這種考察語言層次年代的方法稱作“直接比較法”。

有些學者嘗試從域外的對音、譯音材料中找線索。一旦發現某個語言層次的音韻特點能跟對音、譯音相配合，便可以根據對音、譯音形成的時間推定語言層次的年代。⁵秋谷裕幸近來做了許多有關的研究。例如秋谷裕幸（1999）發現處衢片吳方言和閩方言通攝三等有一個白讀層，東三韻和鍾韻相混，而屋三韻和燭韻仍有區別。這種音韻結構在日本吳音中有平行的反映，因而他認為“早期吳語處衢方言、早期閩語和日本吳音的基礎方言都來源於時代比它們更早的同一個古代江南方言”（秋谷裕幸 1999:171）。秋谷裕幸（2002a:8）則指出，吳方言白讀層有多數南方方言讀作細音的一些中古三等字讀作洪音。這種現象同樣可以用日本吳音來加以解釋：“同吳語一樣，日本吳音把微韻、欣文韻、元月韻、魚韻的見組字也讀為洪音。”由上述兩個例子可以看到，日本吳音能幫助我們考訂各種漢語方言的六朝江東層次。⁶另一方面，潘悟雲（2002）留意到古漢越語的重要性，並以它來作為測定吳方言、閩方言“麻、佳同韻”年代的其中一個依據。王洪君（1987）、徐通鏘（1991）、李如龍等（1999）則對山西南部方言白讀層作過詳細的追蹤，認為這些方言“全濁聲母清化，一律送氣”、“宕攝舒、入聲失落韻尾併入果攝”、“曾/梗分立，曾攝與通攝舒聲的後鼻韻尾前化併入臻、深攝，梗攝舒聲失落鼻尾變為陰聲韻”（王洪君 1987:24）等特點都源自宋代的西北方言。我們之所以知道宋代西北方言的情況，主要是依靠西夏語、漢語的對音文獻。這種運用域外材料來判訂語言層次年代的方法，可稱為“域外比較法”。

不同的語言層次反映了不同時代音韻結構的變遷，因此我們可以根據對古音學的認識來辨認語言層次的年代，也就是楊秀芳（1993:841）所說的“拿漢語音韻史作尺度，定出各語言層的時間”。這種方法和“直接比較法”並不一樣：“直接比較法”講求和擬構出來的古音作直接的比較，這種方法則強調從歷史音韻的結構入手探求層次的年代，可以完全不談擬構。試舉三個例子。李榮（1982:115）認為“北京的文白異讀，文言音往往是本地的，白話音往往是從外地借來的”。侍建國（1998）從中古宕江攝和曾梗攝的入聲著手，對各種北京話的文白異讀和其他官話方言的關係作了深入的報導。他以為“北京話古曾梗攝（德、陌、麥三韻）入聲字今文讀音似乎與江淮官話的關係更密切”，並以兩者在聲母、韻母上的相似性為證。中古的入聲韻尾在現代的江淮官話中都唸喉塞音韻尾。“當這些以喉塞音收尾的入聲字的讀音借入北京話時，由於北京話那時已不再有短促的入聲音節，從江淮官話來的喉塞音也就當然被北京人省略為零韻尾了”（侍建國 1998:402）。從這一點推知：文讀音進入北京話時，中古入聲在江淮官話中已經合併為喉塞韻尾，這大概是明末清初或以前的事。⁷南方方言的情況就更加複雜了。楊秀芳（2003）考索閩方言“檢取”（廈門話[khioʔ]）一詞的本字時，比較了多種閩方言和處衢片吳方言昔韻字的讀法。她最後斷定廈門話[khioʔ]的本字是“撫”，而[ioʔ]這樣的韻母和陽韻白讀層[iō]相配，“也說是說，昔韻

讀 io? 的層次來自魚陽相配的階段，陽聲韻讀 iō，入聲韻讀 io?”（楊秀芳 2003:178）。我們都知道，上古漢語陽部和魚部入聲有陽入對轉的關係。這種結構，到了南北朝時期有所改變。現在看到中古昔韻的“摭”字帶有和陽韻白讀層一樣的主元音，說明它屬於南北朝以前的層次。至於近期引起廣泛討論的“六朝江東方言”，學者往往就是根據《顏氏家訓》、《切韻·序》等文獻的描述——包括“魚、虞有別”、“支與之、脂有別”來辨認現代各方言中相關的層次。梅祖麟（1993、2001a, Mei 1994）對吳、閩兩種方言的江東層次有相當細緻的論述，可以參看。我們把這種探究層次年代的方法稱作“結構比較法”。

在漢語方言裏，虛詞和一些地道的詞彙（如地名、土特產）往往能保留古音。⁸ 有些學者就根據這些詞彙在文獻中的紀錄來判斷它們所屬的層次。例如“芋”字閩方言福安話唸 [tœ]、廈門話[tue]、永安話[tau]，而同屬魚韻的“箸”福安話唸[tœi]、廈門話[ti]、永安話[ty]，兩字顯然分屬兩個層次。梅祖麟（2002）引用劉淑芬（1992）的研究，指出南朝浙東地區盛產芋麻，剛好在同一時期又有較大規模的移民潮從浙東移入福建，因此梅先生認為“芋”屬於南朝層次。又如閩方言漳平話仙韻保留了兩個白讀層，單從語音的角度看很難分出先後。吳瑞文（2002:157）以作量詞用的“件”[kiã]為例，發現“件”作量詞用最早見於南朝梁代的文獻。他由此判斷[-iã]韻母屬於六朝江東層次。我們管這種方法為“詞彙比較法”。

不同的方言如果具有相同的層次，那麼我們可以把同一層次以內的字⁹ 繫聯起來，從而推求它們的年代。陳忠敏（2002）對這個方法的運用作過示範。他發現吳方言和閩方言虞韻字各有三個層次，不單音韻上一一對應，而且每層管字基本相同。例如第一層兩種方言都有“樹”、“鬚”，第二層則有“注”、“芋”等等。“層次特字”的發現對於揭示層次的年代有重要的意義。我們（郭必之 2002）在討論粵方言的層次時，留意到“舐”、“徙”等幾個支韻字的讀法相當特別，不與脂、之兩韻合流，單看韻母歸併模式沒法知道它們所屬的層次。這時候我們便嘗試和其他方言作比較。剛好吳方言和贛方言也有這些“特字”，前人已確定它們屬於南朝江東層次。由於相信“同一層次有相同‘特字’”的道理，所以我們認為粵方言“舐”、“徙”等字的讀音源自南朝江東層次。¹⁰ 這種探求層次年代的方法，本文稱之為“特字比較法”。

還有一種“相對比較法”。這又要提到羅杰瑞（Norman 1979）對廈門話“石”字語音層次的研究。羅先生認為：“第二層”的年代被確定是南朝晚期，那麼其他兩層（“第一層”和“第三層”）必定在其他時候傳入閩方言之中。¹¹ 接著他舉了一些歷史事實（如漢人於兩漢時代入閩）和“石”跟其他字詞的組合作為判定“第一層”和“第三層”年代的依據。可以看到羅杰瑞用了三種方法來識別層次年代：（1）其中一個層次的年代確定以後，其他層次便只可能是更早或更晚，不可能是同一時代的產物。這是“相對”的概念；（2）用歷史事實來證明層次的年代；¹²（3）“石”和其他字詞的組合。第一點就是所謂“相對比較法”。這種方法對後來討論語言層次年代的學者頗有影響。例如梅祖麟（2002）注意到《切韻》聲、韻俱同的“箸”、“芋”等字在閩方言中有不同的發展，因而推論兩組字屬於不同的層次。對於它們所反映的年代，梅先生有幾個論據，其中一個是“箸”組字都是常用的基本詞匯，而“芋”組字不是。“一般的情形是前者比後者早”（梅祖麟 2002:9）。這裏所用的也是“相對比較法”。

這裏有三點需要說明：

第一，除了“相對比較法”和“特字比較法”外，其他四種方法都不是針對語言層次而設的。也就是說，即使面對一種單一層次的語言，¹³我們也可以用“直接比較法”、“結構比較法”來判斷其中音韻現象的年代。

第二，學者在鑑別層次年代時，對於採用哪一種方法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準則。

第三，以上六種方法在很多情況下是互相配合使用的。

事實上，探索音韻結構的變遷，除了要參考韻文的押韻模式和文獻的描述外，還要考慮對音、譯音、以及一些包含特殊音變的詞語所提供的訊息。而上述這些材料往往就是擬構古音的根據。所以當我們分析語言層次的年代時，很自然地便會把這幾種方法結合起來使用，而不會作截然的區分。本文之所以把它們分類，主要是為了方便下文的討論。

三 方法學的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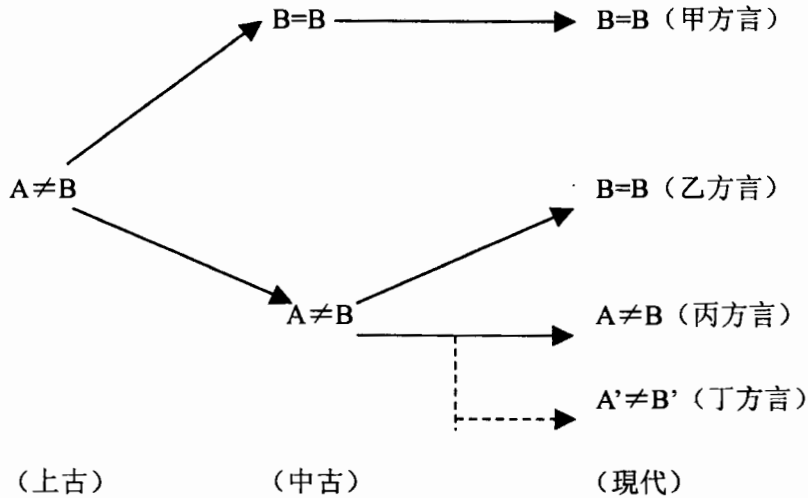
本節主要檢討上述幾種方法的限度，並嘗試分析把它們結合起來使用的一些準則。

“直接比較法”以古音的擬構作為立論的根本。這種方法使用起來的確非常簡便，問題是古音的擬構至今還沒有定論。在決定採用哪一家的系統、以至直接拿古音跟今音比較時，就可能包含了主觀的因素。前引羅杰瑞討論廈門話層次的一段話中，他就用了“strong resemblance”（很像）這種主觀的字眼。而且古音擬構往往缺乏空間的概念，以為古代漢語沒有方言的差異，使人產生“音韻現象形成的年代就等於它傳入方言的年代”的錯覺。¹⁴試舉一個具體的例子。閩方言有幾個支韻字唸[-ia]和[-ie]韻母，如廈門話、潮州話“騎”都讀[khia]，福州話“蟻”讀[ŋie]，有別於一般支韻字。追溯來源，就知道它們都是上古的歌部字。據丁邦新（Ting 1983）的考究，這幾字在西漢時代還是歌部（*-jar）字，但東漢時已轉到支部（*-jei）去。閩方言“蟻”、“騎”等字的特殊讀音，說明閩方言的白讀層“極可能在西漢末年、東漢初年從古漢語方言而出的”（Ting 1983:14）。但事實上，三國時代仍然有少數詩人用歌部字跟“馳”、“奇”、“離”、“馳”等中古支韻字押韻（Ting 1975:93，周祖謨 1996:183），表示歌部支韻字轉到支部的過程存在過地域性差異。後來五胡亂華，北人大批南逃，部分移民就把原歌部支韻字唸低元音的現象帶到江東一帶去（張光宇 1996:61）。至於吳人遷入閩地，又是幾百年以後的事了。可以說，閩方言“蟻”、“騎”等字雖然反映了上古音的內容，但它很可能是通過流行於六朝的江東方言傳入的。江東方言本身就包含了至少兩個層次——“秦漢層次”和“六朝江東層次”（郭必之 2002:19）。閩方言“蟻”、“騎”諸字到底屬於哪個年代的遺物？換個角度說，我們到底應該以音韻現象形成的年代、抑或是音韻現象傳入方言的年代作為斷定層次年代的標準？這個問題亟需認真討論。為了方便起見，我們把音韻現象形成的年代稱為“絕對年代”、¹⁵把這些現象傳入方言的年代稱為“傳入年代”。我們用圖 1 來概括兩個“年代”的差異。

假設上古時期有 A 韻和 B 韻，它們之間存在對立的關係。到了中古時期，這種結構在甲方言的祖語裏泯滅了（B=B），但在乙方言和丙方言的祖語裏依然維持著。乙、丙方言分支以後，乙方言 A、B 韻合流了，只有在丙方言中得以保存。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說丙方言 A≠B 的結構屬於“上古層次”，因為它在上古已經形成；也可以說它是“中古層次”，因為它在中古時期才傳入丙方言裏去。還有一個可能：某些方言（如圖 1 的“丁方言”）本來和乙、丙方言都沒有關係，但通過語言接觸，感染了 A≠B 的結構。而在接觸的過程中，A、B 韻可能都變了質（圖 1 以 A'和 B'表示），儘管它們仍舊維持著對立的狀態。要

為這些方言辨別時間層次，就更加困難了。類似的局面，在使用“結構比較法”時也會遇到。我們將在第四節討論這個問題。

圖 1 音韻現象“絕對年代”跟“傳入年代”的差異



虛詞和特殊詞彙有時的確能反映原屬層次較古老的讀法，但也有不少情況是詞彙和語音並不屬於同一個層面。閩南方言的遠指代詞是“許”（廈門話[hi]、揭陽話[hwi]）。“按照音韻標準，應該屬秦漢時代，但是‘如許’和‘許那’字單用，可靠的用例似乎沒有比《後漢書》、南朝樂府更早的”（梅祖麟 2002:18-19），梅祖麟認為這是“費解”的現象。我們認為這正是詞彙跟語音處於不同層次的表現：¹⁶“許”在音韻上屬於秦漢層次，在詞彙上卻屬於六朝層次。再舉個例子。吳方言、贛方言和粵方言的第三人稱代詞都是“儵”。“儵”最早見於六朝南方的文獻中，殆屬江東層次無疑。¹⁷剛巧“儵”是魚韻字。江東層次其中最重要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魚、虞有別”。從“詞彙比較法”的角度出發，吳、贛、粵三種方言的“儵”都應該和同聲紐的虞韻字——“瞿”——在韻母上有所差別。但這種情況並不見於粵方言中。梅祖麟（1993:40）說：“粵語把江南的‘儵’字北方化了”，意思就是指粵方言的“儵”已經落入“魚、虞”不別的層次裏去，而“魚、虞相混是八、九世紀北方語音的特徵。”粵方言“儵”字存在著詞彙層跟語音層的差異。即使是羅杰瑞(Norman 1979:270)所舉的例子中，“石”字“南朝層次”的讀音[siaʔ]只出現在“石硯”一詞中，我們能說它是南朝的“特產”嗎？“硯”作“石硯”、“硯台”一詞用早見於後魏崔鴻所撰的《十六國春秋》。時代（南北朝）倒是相符了，可是地域卻有南北之異。詞彙層跟語音層的差異好比句法層和語音層的分歧¹⁸，我們沒有必要認為語音跟詞彙屬於同一個層次。¹⁹

“特字比較法”假定不同方言的同一層次必定有同一批“特字”，但“特字”不見得只有一個層次，像處衢片吳方言和閩方言昔韻不少字就各具三讀（楊秀芳 2003）。要比較兩種方言的共同層次，必須先找出它們的對應規律。可是由於層次之間長年的互動，對應規律不一定很工整（楊秀芳 1982:505-507），這時候“對應法”就失去了效用。另一方面，“特字對應法”很大程度上要配合其他方法運用，它基本上不會告訴我們某個層次的年代。

“相對比較法”只能透露“相對年代”（早、晚）。要探求層次的真實年代，還需配合其他方法才行。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相對比較法”又具有其他方法所沒有的特性——它是

專門為辨別層次年代而設計的，而且不受材料限制。我們認為：檢驗層次年代時，的確有必要引入“相對”的概念，不能單單只就某一層次作論斷。

誠如平田昌司所言，“域外比較法”的好處在於年代明晰，容易辨別時間的先後。更可貴的是，對音、譯音通常根據單一方言，這或多或少排除了古代方言差異的因素。換言之，我們可以把某些音韻現象的“傳入年代”（參考圖1）訂得更準。可是域外材料始終經過外國語的整合，有些又受到後人的修改，跟漢語原來的面貌可能頗有差距。我們應該怎樣處理、看待這些材料，便成了關鍵之所在。而且域外材料始終有限，不能在所有場合都依賴它。無論如何，假如方言中某層次跟域外材料有時間、地域上的聯繫，²⁰在語音結構上又有類似的格局，那麼我們可以相信兩者必定有過較密切的關係，而方言層次的年代也可以由域外材料推知。這裏要稍為說明一下所謂“結構上的格局”。我們認為“‘語音內容’容易變化，而‘結構格局’卻很穩固、保守”（徐通鏞 1991:431）。域外材料縱使可能經過整合和修改，但大體的音韻格局仍然會保存下來。因此我們拿方言跟域外材料比較時，要特別注意兩者的結構，而不是實際的讀音。同一時間，我們也要分辨清楚“存古”（shared retention）和“創新”（shared innovation）兩種概念。在進行語言分群（sub-grouping）的研究時，“創新”的重要性遠大於“存古”，這是語言學家所熟知的。²¹同樣的，如果域外材料和方言層次有“共同創新”的方向，那就更能說明兩者之間關係的密切。²²總結上述六種探求語音層次年代的方法，我們認為“域外比較法”最可靠、最能辨別語音層次的年代。層次年代包含了“相對”的概念，所以要把整個層次系統納入觀察的範圍之內，不能單單就其中一層而作論斷。這是“相對比較法”帶給我們的啟示。“結構比較法”和“特字比較法”也有很強的判斷能力，在沒有域外材料可資參考的情形下，這兩種方法或者都能派上用場。本文主張同時用幾種方法來判別語言層次的年代，只用一種方法始終不太穩妥。

這樣又引發了一個新問題：如果幾種方法的指向並不一樣，我們是否以“域外比較法”得出的結果為依歸？我們的答案是：在大部分情況下我們都能信賴“域外比較法”。前文提過，山西南部有些方言白讀層古全濁聲母不論平仄都讀送氣清音。這種現象和“一個保存在十一至十三世紀的西夏·漢對音文獻中的漢方言音系——宋西北方音十分相似”（王洪君 1992:148）。假如我們只著眼於“主流漢語”的發展和擬構，必定會忽略這個保存在山西南部的宋代語言層次。²³當然，遇到非常有力的反證時，我們也不妨變通一下。好像梅祖麟（2001a）考察浙南吳方言時，發現一個“支與脂、之有別的層次”，正好跟《玉篇》的反切互相印證，而《玉篇》所反映的是六朝晚期江東方言的音系。雖然日本吳音支、脂、之三韻大抵無別，²⁴但由於有《玉篇》所提供的“反證”，足以使我們相信浙南吳方言“支與脂、之有別的層次”確實屬於六朝的遺物。²⁵

辨認語音層次年代除了上述六種方法，還有沒有別的方案？我在這裏提出一個較新鮮的意見——“地理比較法”。“語言地理學”（linguistic geography）在日本的漢學界受到高度的重視，但國內似乎仍然乏人問津。語言地理學假定：一個詞的方言形式在地理（空間）上所形成的“橫”的分布可反映各種形式在歷史上（時間）上的“縱”的層次（岩田禮 1995b:203）。同樣地，某些歷史層次在地理上的分布也能顯示它們的淵源，從而確定它的年代。例如以“魚、虞有別”、“支與之、脂不同”為條件考察各種現代方言的江東層次時，會發現這些現象只保存在東南部的方言裏：處衢片吳方言、閩方言保存得最好，北部吳方言、北部贛方言、湘方言次之，粵方言、客家方言也有若干的痕跡（梅祖麟 1993）。²⁶江

蘇南部、浙江、福建以至廣東東部是個連續體，江西、湖南則斷斷續續呈現出江東底層。這說明江東層次曾經廣泛地在這些地區流行過。後來江西、湖南等地接收了大批移民，這些移民的語言代替了原來的江東方言，使它慢慢淪為底層。由此大概可以知道“江東層次”在東南諸方言中的分布。如果另一音韻現象出現的範圍跟“魚、虞有別”、“支與之、脂不同”的地區相若，我們就有理由懷疑這種音韻現象源自江東方言。²⁷現在做一個實驗。中國東南部很多方言梗攝三、四等都有文、白異讀，一般是白讀音唸低元音、文讀音唸高元音。到底白讀音源自什麼年代的層次？先看看“梗攝三、四等有文白異讀”這種現象在地理上的分布，以“明”、“驚”、“聽”、“零”、“石”、“隻”、“劈”、“錫”八字為例（北京大學 1989）。“+”代表有文白異讀，而且白讀的主元音較低。“-”代表沒有文白異讀。

表 1 現代方言中古梗攝三、四等字文白異讀的分布

方言點系屬	明梗三	驚梗三	聽梗四	零梗四	石梗三	隻梗三	劈梗四	錫梗四
北京官話	-	-	-	-	-	-	-	-
太原晉	-	-	-	-	-	-	-	-
濟南官話	+	-	-	-	-	-	-	-
成都官話	-	-	-	-	-	-	-	-
蘇州吳	+	-	-	-	+	+	-	-
溫州吳	+	-	-	-	-	-	-	-
長沙湘	+	-	-	-	-	+	-	-
雙峰湘	+	+	+	+	+	+	+	+
南昌贛	+	+	+	+	-	-	+	-
梅縣客	+	-	+	-	-	-	+	+
廣州粵	-	+	+	+	-	-	+	+
陽江粵	-	-	-	-	-	-	-	-
廈門閩	+	+	+	+	+	+	-	+
福州閩	+	+	+	-	+	-	(+) ²⁸	-

北京、太原、濟南、成都屬北方方言區，除濟南“明”字有文白之別外，其他七個方言點一律沒有異讀。閩方言、贛方言和湘方言似乎最能保存文白的分野²⁹，這點和“魚虞有別”、“支與脂、之不同”所分布的地區大致相同，只是吳方言的文白並不怎樣突出。這可能是受到北方方言大量侵蝕的緣故，也可能是自己產生了**iā* > *iŋ*的音變。南部吳方言有較多梗攝三、四等字唸低元音或帶文白異讀的現象。³⁰事實上，平田昌司（1995）早已根據日本吳音的材料，指出“在東南方言梗攝三四等白讀層出現的低元音就是六朝江南音系某一語音層次的遺留”（平田昌司 1995:127）。

“地理比較法”只能作為其他幾種方法的旁證，基本上不可以單獨使用。因為我們在使用它以前必先觀察幾個分屬不同層次的音韻現象在地理上的分布，再以它們作為標準來考量分析對象所屬的年代，手續相當複雜。而且這種方法前人較少論及，有較多暫時未能克服的困難：(1)音韻現象在各種方言殘留的比例不容易計算出來，目前還沒有客觀的標準。前文提到“分布地區相若”也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2)各種方言的整合能力不一樣。像粵方言的整合能力較高，難於分辨層次；閩方言的整合能力較低，容許不同時代的層次架疊

在一起（李如龍 2001:169）。我們只可以這樣說：分布大致相同的音韻現象很可能源自同一層次，但同一層次的音韻現象卻不見得必定有相同的地理分布。“地理比較法”最大的優點在於可以配合“語言地理學”，除了能作為釐定層次年代的標準外，還可以告訴我們音韻現象擴散/消亡的軌跡。前面的幾種方法都側重於歷史文獻的考究，而“地理比較法”則主張從語言共時的現象探討歷史的發展，其性質與其他方法有別。從多個角度來作觀察，必定能夠把層次的年代訂得更準確。

四 “絕對年代”的難題

前文已經多番強調，某種語言現象形成的年代跟它傳入方言的年代絕對是兩回事，主要原因是古代也有方言的分歧，而方言本身就有層次的架疊。我們在討論語言層次時，應該留意其中現象形成的年代、還是它傳入方言的年代呢？這個問題牽涉到“語言層次學”中若干關鍵問題，非常重要。

梅祖麟（2001a）曾經比較過吳、閩兩種方言的“六朝江東層次”，並以音韻現象流行的年代作為參照點。³¹有了這個認識，我們就可以把不同方言的同一層次拉到一個平面上，並用比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來擬構它們共同母語的音值。這是語言層次研究中一個最主要的目標。梅祖麟的研究發現，“江東南朝音”魚韻的音值是[*-iə]，而“閩地南朝音”則唸作[*-uə]³²，兩者的介音並不相同。根據文獻的記述，可知“閩地南朝音”的[-u-]是“後起的，是閩地的特產，江東方言沒有這個音”（梅祖麟 2001a:12）。³³在梅祖麟打下的基礎上，吳瑞文（2002）進一步對吳方言跟閩方言的“江東層次”作出比較，嘗試尋求兩種方言在先、仙二韻的對應規律。結果如表 2。

表 2 吳、閩方言先四仙三的對應（吳瑞文 2002:158）

古江東方言層	先四	仙三
吳方言	iä	iē
閩方言	ĩ	iä
古江東方言	*ian	*ian

這說明六朝江東方言三、四等的差異不在於介音的有無，而是在於主元音高低。³⁴這兩篇文章成功地把不同方言（吳、閩）的同一層次（江東層次）聯結起來，大大超越了前人在不辨層次的情況下擬構古語的做法。這對於方言層次研究和古音擬構來說，都是一大突破。

那是不是說我們不需要注意語言現象進入方言的年代呢？當然不是。現在嘗試用一個例子來說明問題。閩方言有一批原歌部的支韻字仍然維持低元音的唸法，與一般支韻字的讀音不同，前文已略及之。其實廣州話也有那幾個“特字”，³⁵不過具體情況與閩方言稍有不同。以“騎”、“奇”、“蟻”三字為例。見表 3。

表 3 閩、粵兩種方言原歌部支韻字讀音的比較

方言點系屬	騎	奇	蟻
廈門閩	khia	khia	hia
福州閩	khie	ki ³⁶	ŋie
潮州閩	khia	khia	hia
廣州粵	khe	khe ³⁷	ŋei

“騎”、“奇”、“蟻”在閩方言中大抵都有一致的韻母，顯然源自同一層次。這幾個字雖然在廣州話中同屬“特字”的範疇，但“蟻”字的韻母唸[-ei]，跟讀[-e]的“騎”、“奇”有異。事實上，“蟻”在許多內陸的客贛方言中都有特殊的讀法，而“騎”、“奇”在那些方言裏則和一般支韻字無別。廣州話“蟻”不合一律規律的唸法看來是經客贛方言傳入的，傳入的年代很可能在唐末、宋初的一、兩百年間（郭必之 2002:19-20）。用“特字比較法”來判斷，廣州話的“蟻”和廈門話、福州話的“蟻”字一樣，同屬秦漢層次，不然的話就很難解釋為什麼這些方言擁有同一個“特字”。但從“來源”的角度看，廣州話的“蟻”和“騎”、“奇”應該分屬兩類：兩者傳入廣州話的源頭不同、年代又有先後之別。源頭、年代有異，往往意味著語音內容都不一樣。如果不留意語言現象在什麼時候傳入方言、只考慮“絕對年代”，就會把廣州話“蟻”、“騎”諸字的地位等量齊觀。這對於層次擬構和比較的工作，會有一定的影響。我認為討論語言層次年代時，最好能分別列明“絕對年代”和“傳入年代”。雖然並不是每一種情況都能說明白，但在“寧缺勿濫”的原則下，遇到有疑問的例子就不加以採用。

五 結論

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和努力，漢語的“語言層次學”已經累積了可觀的研究成果。現在是適當的時候來做個小小的總結。本文認為漢語方言層次年代的確認，至少有兩個重要的意義：

(1) 增加對方言史的認識。在漢語史研究中，前人往往只留意“主流漢語”的發展，忽略了對各種方言的關注。方言層次年代得以釐清，方言史的重建也就多了一項可靠的指標。漢語發展的模式是多維的——互相接觸、互相滲透，自古以來已經如是。所以我們有必要研究方言史。³⁸

(2) 增加對方言關係的認識。方言中疊置著不同時期的語言層次，其實某程度上見證了“權威方言”或“主流漢語”的發展（楊秀芳 1982:3-4）。辨清了語言層次的年代，就可知道方言在什麼時候受到“主流漢語”（或鄰近權威方言）的影響。這對於了解方言之間的关系很有幫助。例如楊秀芳（1982）留意到潮州話有一個廈門話、泉州話和漳州話都沒有的文讀層：“這一層的許多特點在漢語音韻史的發展上要比第二層來得晚，並且和現代的粵方言有近似之處……代表南方系統的《洪武正韻》還有濁聲母，而潮州第三層借入時，濁母已經清化。由這一點看，第三層進入潮州的時代可能在《洪武正韻》以後”（楊秀芳 1982:500-511），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

附注

- 1 要辨認層次的年代，首先要知道層次的數目。方法大抵有兩個：(1)從同一個詞的異讀（即所謂“文白異讀”）推知；(2)從系統的不一致推知。但實際操作起來卻會遇到不少困難。參閱何大安（2000）。
- 2 張敏（Zhang 2000）和項夢冰（2002）最近對漢語方言的句法層次研究踏出了第一步。我們期望將來會有更多相關的討論。
- 3 事實上，我們之所以對層次年代感到興趣，多多少少和羅先生這篇文章的觀點有關。
- 4 根據李方桂（1980）的系統，上古魚部是[*-ag]。
- 5 平田昌司（1995:124）認為利用域外材料來判別語言層次年代有以下的好處：“活方言是語音歷史比較研究工作上最寶貴的材料。不過，域外材料也有活方言不能代替的優點：文獻成書年代和繼承關係比較

- 清楚，容易識別語音層次的先後。”
- 6 這裏的“江東方言”相當於秋谷裕幸所指的“江南方言”。這是呼應一般學者的叫法。
 - 7 侍建國並未言明北京話文讀音的年代，不過“江淮官話入聲字以喉塞音收尾的音變，不晚於明末清初”倒是他的意見。
 - 8 鄭張尚芳（2002c）對漢語方言中的“滯古層次”作過深入的研究。在他舉的例子中，就有不少虛詞和地道的詞彙。另外，張光宇（1993）曾以“家”字地名為例，討論了地名的存古性質，可以參看。
 - 9 陳忠敏（2002:73）把這些字稱為“層次特字”：“所謂‘層次特字’是指早期讀音層次裏的那些特有的字在關係密切的鄰近方言裏，相同層次必定含有相同的層次特字。”
 - 10 這只是簡單的引述，還有其他論證。詳情請參看原文。
 - 11 原文這樣寫：“If we assume that they are (按：指“第二層”的讀音) in fact reflexes of forms borrowed from a language close to that canonized in the Qièyùn, then the first and third groups must belong to other periods.” (Norman 1979:271)
 - 12 由於用歷史事實來說明層次年代跟語言學沒有直接的關係（況且也不見得歷史事件跟語言層次的產生有必然的關係），本文不擬詳細討論。
 - 13 是否所有語言都有層次之分？這牽涉到“同質”結構和“異質”結構的理解。暫時不作討論。
 - 14 張光宇（1996:56-57）打了一個很有趣的譬喻：“古代器物製作的年代與棄置的年代並非完全平行於地下層位的深淺。製作時期早而丟棄時期晚也所在多有。邏輯上，先製作的器物先棄置，後製作的古器物後棄置。但我們不能純依這種邏輯來看漢語方言的形成，因為漢語方言的形成是古器物‘棄置’年代的問題，不是古器物製作年代的問題。”方言裏常常有存古的現象，但並不代表方言在那些現象形成的年代就從主流中分支出去。
 - 15 這裏所指的“絕對年代”相當於鄭再發（1966:642）的“錐頂”及何大安（1999:102）的“露頭”。
 - 16 梅祖麟（2002:18）談到利用詞彙來釐定語言層次的重要性：“人用兩隻眼睛去看，可以判斷距離。一隻眼睛瞎了，或者遮住了，只用一隻眼睛去看，開車一定會撞車，打網球管接不著球。同樣的，用文獻（按：指文獻中的用例）和音韻兩個角度去看，才能超越文獻資料的限制，才能把虛詞或虛詞來源進入闡地的時代訂得更準。”我並不反對梅先生的意見。我主張同時用上文提到的幾種辦法來判斷語言層次的年代（詳下文）。單用“詞彙比較法”，我們覺得不太安穩。
 - 17 李榮（1980）對“僕”的歷史來源以至在各方言中的用法有詳細的論述。
 - 18 有關句法層和語音層的差異，參閱梅祖麟（2001b）。
 - 19 連金發（Lien 2001）研究過台灣閩南方言由不同語音層次的字（語素）所組成的詞彙。他的論說，有力地證明了語音層次和詞彙層次不必等同。
 - 20 例如一般以為日本吳音源自六朝的江東地區（平田昌司 1995:125），閩方言則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江東層次（鄭張尚芳 1998:291-296），我們就可以說兩者在時間（六朝）、地域（江東）上都有密切的關係。
 - 21 Fox（1995）Chapter 9 對於這方面有詳細的說明。
 - 22 很多閩方言都有“魚、虞有別”以及“虞、尤合流”的現象。這兩點在日本吳音中都有所反映。但後者的重要性顯然高於前者。因為“虞、尤合流”係“創新”的行為，而“魚、虞有別”則屬“存古”之範疇。此外，在使用“結構比較法”時，也應該留意方言層次和材料間是否有“共同創新”。
 - 23 就筆者所見的系統中，從來沒有人把宋代“主流漢語”中並、群、從等中古全濁聲母擬構為送氣清音。所以如果拿晉南方言的白讀層跟“主流漢語”比較，根本找不到對應。
 - 24 “己”讀[ko]可能是古之韻的痕跡。
 - 25 承蒙平田昌司先生提醒：日本的“推古遺文”（即推古天皇時代的金石文所反映隋代以前的借音）支、脂、之三韻依然分立。而南朝梁代由僧加婆羅翻譯的《孔雀王呪經》則反映了南人“支與脂、之有別”的現象，參看蒲立本（Pulleyblank 1979:316-317）。這說明域外材料之間也有分歧，篩選、分析時一定要加倍留心。
 - 26 由於材料匱乏，暫時只能以“魚、虞有別”、“支與之、脂不同”等“存古”的現象作為辨認層次的條

- 件。如果找到現代方言和江東方言“共同創新”的規律，相信更能準確地描畫出江東方言的分布。
- 27 岩田禮調查“膝蓋”、“兒子”等詞匯在漢語方言中的分布時發現：吳方言、閩方言往往用同一種形式，與西面的粵方言、贛方言跟湘方言所用的形式並不相同，中間的分野頗為明顯。岩田禮(Iwata 1995a:215)認為：“In my view this evidence reflects the distinction of linguistic strata in south China: Wu-Min specific and Gan-Xiang-Yue specific.”可見屬於同一層次的語言現象，在地理上應該有相似的分布。
- 28 福州話“劈”白話音 [phieʔ]，文讀音 [pheiʔ]。[ieʔ]韻源自早期的 [iaʔ] 韻。現在福州話很多字還有 [ieʔ]、[iaʔ]兩讀。
- 29 參考張光宇(1990)所收諸篇的討論。
- 30 例如開化話“驚”[kuā]、“石”[dzɛ]、常山話“影”[ɿ]、慶元話“柄”[ʔbā]、“影”[ā]、“惜”[ɕiaʔ]等，參閱曹志耘等(2000)。
- 31 梅先生主要根據文獻的描述來認定吳、閩方言的“六朝江東層次”。
- 32 具體論證的方法本文不擬詳細討論，請參閱梅祖麟(2001a)有關章節。
- 33 對於介音[-u-]的增生，鄭張尚芳(2002b:102-106)另有一番見解。
- 34 秋谷裕幸(2001)研究過處衢片吳方言咸山兩攝的三、四等字，並擬構了它們的原始形式。他的結論跟吳瑞文(2002)並不一樣。我認為秋谷先生的重點在吳方言，而吳先生的重點則在於閩方言。結論不一樣，是可以理解的。
- 35 我們不清楚其他粵方言“奇”字是否有白讀音。這裏只舉廣州話為例。
- 36 “倚”福州話唸[khie]。我們猜想“奇”字本來也有[khie]的讀音，只是在文白異讀競爭的過程中給淘汰掉了。這和廣州話“蟻”讀[ŋei]的情況不一樣。
- 37 郭必之(2002:15-16)把廣州話[khe le] (古怪、難看)的本字考訂為“奇離”。[khe]是“奇”的白讀。
- 38 丁邦新(1992)討論過研究方言史的重要性，可以參看。

參考文獻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1989 《漢語方音字匯》，文字改革出版社。
-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 2000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中國語學研究·開篇》單刊 12，東京好文出版。
- 陳忠敏 1998 吳語及鄰近方言魚韻的讀音層次——兼論“金陵切韻”魚韻的音值，載《第六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
- 丁邦新 1992 漢語方言史和方言區域史的研究，《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 1 輯。
- 郭必之 2002 從虞支兩韻“特字”看粵方言跟古江東方言的聯繫，Paper presented at IACL-11. Nagoya: Aichi Prefectural University, 將刊於《語言暨語言學》。
- 何大安 1999 古漢語聲母演變的年代學，載《林炯陽先生六秩壽慶論文集》，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何大安 2000 語言研究中的層次問題，《漢學研究》第 18 卷特刊。
-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商務印書館。
- 李 榮 1980 吳語本字舉例，《方言》第 2 期。
- 李 榮 1982 《音韻存稿》，商務印書館。
- 李 榮 1996 我國東南各省方言梗攝字的元音，《方言》第 1 期。
- 李如龍、辛世彪 1999 晉南、關中的“全濁送氣”與唐宋西北方音，《中國語文》第 3 期。
- 李如龍 2001 《漢語方言學》，高等教育出版社。
- 劉淑芬 1992 《六朝的城市與社會》，台灣學生書局。
- 梅祖麟 1993 南北朝的江東方言和現代方言，Paper presented at ICCL-2. Paris: Ministère de la Recherche et de l'Espace.
- 梅祖麟 1995 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又見梅祖麟《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 2000。

- 梅祖麟 2001a 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第1期。
- 梅祖麟 2001b 吳語“吃仔飯”的斷代問題，*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9.1。
- 梅祖麟 2002 幾個閩語虛詞在文獻上和方言中出現的年代，載《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和變化》，何大安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 潘悟雲 1995 溫、處方言和閩語，《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潘悟雲 2002 吳語中麻韻與魚韻的歷史層次，載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平田昌司 1995 日本吳音梗攝三四等字的讀音，《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中國東南方言比較研究叢書》第1輯，上海教育出版社。
- 平田直子 2000 吳語における梗宕曾攝の音韻變化について，《中國語學》第247期。
- 秋谷裕幸 1999 吳語處衢方言、閩語和日本吳音的通攝三等韻，*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28.2。
- 秋谷裕幸 2001 吳語處衢片的咸山兩攝三四等字，《中國語文研究》第1期。
- 秋谷裕幸 2002a 吳語中以主要元音為條件的中古三等字讀洪音的現象試析，Paper presented at IACL-11. Nagoya: Aichi Prefectural University.
- 秋谷裕幸 2002b 早期吳語支脂之韻和魚韻的歷史層次，《中國語文》第5期。
- 侍建國 1998 官話音音的地域層次及其歷史因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9卷第2分冊。
- 王洪君 1987 山西聞喜方言的白讀層與宋西北方音，《中國語文》第1期。
- 王洪君 1992 文白異讀與疊置式音變——山西聞喜方言文白異讀初探，《語言學論叢》第17輯。
- 吳瑞文 2002 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語言暨語言學》3.1。
- 項夢冰 2002 連城客家話完成貌句式的歷史層次，《語言學論叢》第26輯。
- 徐芳敏 2003 《閩南方言本字與相關問題探索》，台北大安出版社。
- 徐通鏞 1991 《歷史語言學》，商務印書館。
- 岩田禮 1995b 漢語方言“祖父”“外祖父”稱謂的地理分布——方言地理學在歷史語言學研究上的作用，《中國語文》第3期。
- 楊秀芳 2003 從方言比較論吳閩同源詞“摠”，《語言暨語言學》4.1。
- 楊秀芳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博士論文。
- 楊秀芳 1993 論文白異讀，載《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台北大安出版社。
- 張光宇 1990 《切韻與方言》，臺灣商務印書館。
- 張光宇 1993 河北山東的“家”字地名，《清華學報》23.3。
- 張光宇 1996 《閩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書局。
- 鄭再發 1966 漢語音韻史的分期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6卷。
- 鄭張尚芳 1998 吳語，載《中華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第18卷《吳越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 鄭張尚 2002a 閩語與浙南吳語的深層聯繫，載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鄭張尚芳 2002b 方言介音異常的成因及 e > ia、o > ua 音變，《語言學論叢》第26輯。
- 鄭張尚芳 2002c 漢語方言異常音韻的分層及滯古層次分析，載何大安主編《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 周祖謨 1996 《魏晉南北朝韻部之演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Baxter, William H. (白一平). 1995. Pre-Qin Distinctions in the Min Dialects, 載曹逢甫、蔡美慧編《第一屆臺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台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Fox, Anthony. 1995.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wata, Ray. (岩田禮). 1995a. Linguistic Geography of Chinese Dialects — Project on Han Dialects (PHD),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24.2:195-227.

- Lien, Chinfu. (連金發). 2001. Competing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ed. by Hilary Chappell, 309-33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i, Tsu-lin. (梅祖麟). 1994. More on the Aspect Marker *tsi* in Wu Dialects,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Languages & Language Change*, ed. by Matthew Y. Chen, and Ovid J-L. Tzeng, 323-332. Taipei: Pyramid Press. 又見《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510-526，商務印書館 2000。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方言》1979.4:268-274.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91. The Mi0n Dialec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ed. by William S-Y. Wang, 325-360.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3.
- Pulleyblank, Edwin G. (蒲立本). 1979. Some Examples of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 from the Southern Liang Dynasty (A.D.502-556), *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Herbert Franke*, ed. by Wolfgang Bauer, 315-327. Wiesbaden: Steiner Verlag.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魏晉音韻研究》). Special Publication No.65.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83.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4.4:1-13.
- Zhang, Min. (張敏). 2000. Syntactic Change in Southeastern Mandarin: How doe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Reveal a History of Diffusion?,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i Fang Kuei: Essays on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ialects*, ed. by Pang-hsin Ting, and Yue, Anne O., 197-242.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an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郭必之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